

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超越^①

李军林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8)

摘要: 话语是一种思想体系及行为的总和,革命是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中国古代革命话语分为儒家和农民两大派别,当然,它们都有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才是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标志着传统革命话语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关键词: 革命话语; 儒家革命话语; 农民革命话语;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

中图分类号: K201;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4-0104-06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 Surmounting
of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LI Jun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 Discourse is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e ideological system and performance, and revolution is to seize power by using violent means.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ay Confucian and peasants', but both of them were limited by history. Marxis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s the most advanced and scientific discourse system. And it built Marxis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ombining itself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China, indic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 leap of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Confucian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peasan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Marxis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话语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分支之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语义政治学。”^[1]我们选择话语理论来分析传统革命思想的历史发展,首先在于话语(discourse)是一个中性词语,本身没有任何褒义或贬义的色彩。其次,话语分析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群体的普遍关注。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形式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2]1}。设计各种现实变迁的方案越来越多地包括进行语言设计的努力,而对以往语言的分析,正是我们今天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说:“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既是权力斗争的场所,也为权力斗争提供模式,不同类型的

话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它们最终又可以获得‘重新介入’。”^{[2]63}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策略地利用这些话语进行斗争,以期话语秩序的重建。

所谓“革命”,“在社会学的术语中”,“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3]35}“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3]37}在这里,革命与两个关键词相关,即“暴力”和“政权”:“革命”特指政权的彻底变革,而其方式则是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中国语境中,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革命。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以往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农民起义和政权变

① 收稿日期: 2010-03-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09YJA710020);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资助项目(0801011A)
作者简介: 李军林(1968-),男,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学研究。

更。我们研究中国传统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转换,目的是为今天现代化的和谐话语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一、儒家革命话语的历史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无疑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说教,以及强调“和谐”,提倡“和为贵”的和谐话语。但它还有另外一面的内容,那就是讲革命、求变革。

“革命”一词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里早已有之,如“殷革夏命”^[4],指殷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正如许慎《说文解字》里所说:“兽皮治去毛曰革”,含有脱离、剧变和死亡之义;“命”意谓生命、命运、天命之义。两字合成“革命”,是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政治话语,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5],就是指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使用的都是暴力。所以说,“革命”者,“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也。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武装斗争推翻旧的政权的“革命”,在使用暴力层面的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所以,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里,贫农赵玉林在批斗恶霸地主韩老六时说:“非革他的命,不能解这个恨!”^[6]但作为儒家的经典话语,《易经》中的这段话,含义本是十分丰富的:它首先是对自然现象的描绘,其次是讲人世的革政,最后讲革政的合法性。

上述充满张力的“革命”话语,引起了后儒的激烈争论,即使是靠革命起家的古今帝王,取得政权之后都不乐意儒生再谈革命,如汉景帝制止了今文家辕固生和黄生的争辩,指出:“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7]朱元璋则以否定历代“革命”的方式来宣称自己“革命”的合法性,他指出:“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8]因此,后儒在触及这个理论禁区时都小心翼翼。所以,革命论虽出于三代,但在汉代以后不再彰显,直到晚清才又成为显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很少有人用它来形容改朝换代,以至于它的本来意义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但问题仍然存在,谁能决定革命的合法性。决定革命合法性的根据是什么?孟子认为是仁义道德,当齐宣王就汤武革命的正当性询问他时,他的回答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9]荀子更是明确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10]按孟子的观点,政权交替基于国贼与行义者的区分。

而荀子则直接称汤武为圣人,指责那些认为汤武弑君不义的说法为“世俗”之见,而非道义之高见。可见,孟荀构建的是道义革命论,正如蒙文通所说:“孟荀是先否认桀纣所受的天命,然后提出汤武不弑篡。《易传》则是承认桀纣所受的天命,但是却认为这个天命是可以革去的,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概念。”^[11]

汉代今文学家对汤武革命的解释,一方面传承了孟荀的道义革命论,另一方面,对革命进一步神圣化,使汤武革命从顺天应人向受命于天转变。干宝明确指出:“帝王之兴,必俟天命”^[12]。即圣人“受命”而革命,其神圣性自然而得。按先秦和汉儒的释义,汤武革命就是一种道德——宗教革命;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表述就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推翻落后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历史的必然。

但汉代以降,儒家追求的是成圣成王,不再提“革命”一词。即使提及,意思也只是现代的变革论。刘晓枫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书中,对儒家革命精神的起源与现代转换进行了探讨,他从基督教与现代中国革命关系入手,系统阐发了汤武革命的释义学背景、汉代今文学家的“素王”革命论、心学成圣论与儒家革命精神的关系,以及现代语境中中西革命观的异同,从而完成了对传统“革命”精神流变的考察。

“革命”一词成为新的汉语时代用语,源于日本。日本在走向近代化时,采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来译读西方文明中代表历史前进的“Revolution”一词,但排斥了中国“革命”一词中固有的“武力”内涵,取而代之的意思是尊王改革。这样,就使“革命”一词不仅有别于中国《易经》中的本义,而且也剔除了西方文明“Revolution”中含有的暴力激进的思想。究其原因,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说:“两者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两国传统之差异,即一方是根植于中国易姓革命思想的传统;另一方则是根植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观这一历史事实。”^[13]

到明治时代,由于“革命”一词包含的尊王改革之义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成了同义语。日本人对“革命”的这种理解,得到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的热烈追捧,他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4]显然,这种“革命”就是“变革”。后来,他提出的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均指这样的“革命”。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均提到过“革命”一词,但所持态度截然不同,前者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该词,而后者则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该词。这就使传统革命话语逐步突破原先历史和文化的局限,开始担负新的历史使命。

改良派代表章炳麟竭力倡导改革,反对革命,要求“以革政挽革命”,攻击“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15]。康有为更是把法国革命描述得极其悲惨:“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便频仍,迄无安息,旋入回渊,不知所极。”^[16]“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16]9}尽管章炳麟和康有为对西方革命身怀恐惧,并极力贬斥,但他们把这种革命看作是难以抗拒的世界性潮流,也就是说,他们从否定意义上接受了近代西方“革命”的意义,而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造成微妙的错置。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从肯定的角度使用“革命”一词,并率先恢复了“革命”的本义。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在清季已末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也有相似记载:“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17]孙中山自己在《中国之革命》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某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扶欧洲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8]。“余之革命主义内容,赅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18]可见,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也包含着有关民族、民主和民生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承诺。正如邹容所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19]这就把“革命”一词的古今中外的意义融为一体了。

二、农民革命话语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农民与儒家知识分子分享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早在夏王朝,就有夏桀残暴,国人(居住在城中的平民百姓)起义的传说。据《尚书》所载,商汤对国人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那么,夏桀罪在何处呢?“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鉴于此,国人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吼声,^{[4]68-70}也就是说,夏朝国人起义,源于夏王无道,违背天命。而国人起义,乃是受命于天,并将得到上天的赏赐。而问题的关键是,起义或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意味着暴力最终解决一切困境。

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对于后来农民战争和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历来被人们重视。所以,陈胜、吴广的农民革命话语也具有代表性。从根本上讲,陈胜、吴广起义源于秦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的激化,被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正如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所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天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7]董仲舒将一切责任推到商鞅的身上是不公正的,但说明当时现实的确是民不聊生。

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贻误了行期,按秦律当斩。《史记》所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在这种情况下,陈胜、吴广才合计:“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20]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迫起义的。

即使决定了起义,陈胜、吴广还是要进一步寻求革命的神圣性,于是,他们共同编造了“渔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故事,让神鬼赋予他们起义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就好像汉高祖刘邦起义之时,大蛇当道,高祖斩之,后人传为赤帝之子杀白帝之子,实为天意。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用计杀戮了两位都尉,并以其头颅祭旗,表明了暴力革命的豪情壮志。至此,陈胜、吴广最终喊出了他们的革命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老、豪杰进一步对这个口号进行

了补充:伐无道,诛暴秦。从这个革命口号,我们可以得出:一方面,革命是合法的,因为秦王无道,暴虐百姓。不仅如此,革命也是神圣的,因为天神、地祇、人鬼已经知晓并同意了他们的起事。另一方面,革命是残酷的,王侯将相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以武力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使自己成王成侯。这样,秦末农民起义就为我们建构了“削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革命气概,发扬了光荣的斗争传统。

当然,也有人认为,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具有阶级觉悟性,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从而自觉地发起革命,并通过武装暴动来推翻秦王朝的反动统治。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笔者认为有拔高的嫌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先秦农民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水平,这是不现实的。首先是革命思想局限性的问题。陈胜早有鸿鹄之志,与同耕者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尤其在失期当斩的死亡威胁下,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鼓动戍卒起义反秦,^{[20]1952}否定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和固有的等级秩序,堪称农民反封建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但陈胜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是他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决定的,但也受到战国以来社会阶级结构发生蜕变和世侯世卿之局被破坏的时代影响。“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臆、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21](卷2)},这是战国以来较为普遍的现象,所以墨子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22]46}可见,富贵贫贱可以移易的思想并非陈胜独有,也非陈胜始有,只是说明陈胜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改变自身现实,从而实现成圣成王目标。事实上,他自立为王、富贵荣华以后,对当年的同田老友并不是“无相忘”,而是“斩之”。陈胜、吴广的革命思想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

其次是群众观点局限性的问题。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因为是第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无古人,以首创之功载入史册。他们在起义前注意了动员组织工作,和同时代的其他几支起义军比较,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与以后几次全国性大起义,如黄巾军起义、黄巢起义、白莲教起义相比较,他们的宣传组织工作又是不够的。当然,他们不可能具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更无从做到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陈胜对待他的老朋友的记载来看,就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后是领导权思想的局限性问题。史料所载,陈胜在旧贵族和农民起义领袖之间是划不清界限的,陈胜杀了农民起义军领袖葛婴,原因是葛婴在不知陈胜称王的情况下立襄疆为楚王,襄疆本人并非豪门强族之后。尽管后来葛婴采取了断然措施,以示全力拥戴陈胜,但仍然得不到他的宽恕。可是对于其他一些公然称王的旧贵族,陈胜却让了步。可见,陈胜并没有解决好领导权的问题。尽管陈胜吴广起义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毕竟开创了农民革命话语之先河,为后续农民革命提供了话语指南。

东汉黄巾军起义,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革命口号,^{[23]1553}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封建迷信话语,缺乏革命性,其实不然。两汉时期,谶纬迷信盛行,阴阳五行泛滥。《后汉书》记载:“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23]357}也就是说,黄巾军以迷信的形式表达了用武力推翻东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决心。之所以说“岁在甲子”,是因为“甲子为初始”,^{[24]卷93第8}六十数终,岁在甲子,当与人民重新更始的意思。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黄巾军独具特色的农民革命话语,不得不提到《太平经》中的一些革命思想:一是指出了地主阶级的无穷罪恶。“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而地主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地主阶级不仅占有大量财物,宁可令其腐烂也不施与穷人,而且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所以“百神憎之”。二是主张“财产公有”,人人都有平等享用的权利。“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24]卷67}

《太平经》与黄巾军关系密切,是张角领导农民起义的组织文献,其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无疑是小农的思想方式,它是企图以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即是以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来改造当时社会,达到摆脱封建剥削的目的。这种思想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其实质是以“财产公有”的制度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封建特权,因此,它构成农民反对地主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农

民革命话语的最高水平,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统治者的强取豪夺,但其中最使人不能忍受,并导致其陷入绝境的就是兵役和徭役负担过重。其中早期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诗歌《无向辽东浪死歌》最能说明问题:“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25] 5619}这个革命口号无疑令人振奋,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说明当时农民起义纯粹是为了争取生存权而斗争。所以起义呈多点爆发、参加阶层复杂、力量分散的特点,表明隋末农民革命觉悟很有限,他们虽然杀掉了暴君杨广,却对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很少斗争,这种革命话语实践的历史局限性在唐末农民起义中得到了较好的弥补。

唐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高利贷猖獗,阶级分化明显。此时的农民革命话语有了全新的内容。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唐末农民起义的口号反应了农民朴素平均主义思想和革命觉悟的提高。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明确提出“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的口号,^{[25] 8080}“罗平”的含义已经难以考证,但从“天平”二字观察,似有“为天均平”之意。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唐末农民战争反应了农民初步的阶级意识。他们不仅反对封建国家,而且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他们的成分相对单纯,力量相对集中,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对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进行前所未有的斗争,而“遇穷民于路,急行施遗。”^{[26] 3668}所有这些表明,唐末农民革命话语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

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首先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27] 卷8}并在革命实践中,“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28] 卷25}这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平均主义思想的伟大壮举。钟相、杨么将北宋农民革命话语推向了高潮,他们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纲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推行这一纲领的政治主张,即封建史学家所说的:“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刑法,谓劫财为均平”,称义军为“爷儿”。他们主张彻底推翻压迫人民的南宋政权,故在起义后“相遂称楚王,改元天载”^{[29] 卷81}。钟相用短短六个字的精确语言,概括了当时农民阶级的基本主张与要求,表

述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从而构成了农民革命的政治与经济纲领:用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法权的贵贱等级制度,用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反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标志着中国古代农民革命话语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元朝末年,韩山童等人编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神话传说,^{[30] 卷3}组织和发动了农民起义。刘福通更是明确提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口号。韩山童战死后,朱元璋接过义军领导权,他打出的旗联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31]可见,元末农民革命话语在理论上并无大的建树,只是在组织上更严密,在实践上更勇猛。同时,从他们的革命话语中,可以看出元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双重激化。这也成为洪秀全“诛尽胡虏开天国,斩灭妖魔定太平”,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先声。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话语在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发展到巅峰,李自成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和“平买平卖”的口号,直接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反映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标志着我国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已开始触及到阶级斗争深刻的经济根源,斗争的内容进一步深化,对广大农民的吸引力更加强大。尽管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们不能抹杀其进步意义。

三、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超越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输入中国,并逐步与中国固有的革命话语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才最终实现了古代革命话语的现代超越。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相关论述,同时,也包括列宁关于上述问题的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共产主义原理》、《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与革命》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些文本中,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2] 250}但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特点,“它使阶级对

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2]251}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263}无产阶级要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2]271-272}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27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档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2]285-286}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也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情有独钟,他们在选择中传播,在传播中选择,使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并逐步实现中国化。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当然,也离不开传统革命话语的积极作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种话语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革命话语的转型也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赵一凡. 欧美新学赏析[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2] 诺曼 TS·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3] 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M]. 吕一民,顾航,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4] 尚书[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202.
- [5] 周易[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220.
- [6] 周立波. 周立波文集(第1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3.
- [7]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679.
- [8]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0.
- [9]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45.
- [10] 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35.
- [11] 蒙文通. 蒙文通文集(第3辑)经史抉原[M]. 成都:巴蜀书社,1995:167.
- [12] 转引自萧统. 文选(第6卷)[M]. 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147.
- [13] 沟口雄三. 中国民权思想的物色[C]. 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343.
- [14] 梁启超. 释革[N]. 新民丛报,1902,(22).
- [15] 章炳麟.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N]. 时务报,1897,(19).
- [16] 康有为. 进呈法国革命记序[C]. 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17] 陈锡祺. 孙中山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1:102.
- [18] 孙中山. 中国之革命——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而作[C]. 转引自黄彦. 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 [19] 周永林. 邹容文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1.
- [2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950.
- [21] 赵翼. 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M]. 北京:中国书店,1987:卷2.
- [22] 墨子. 墨子[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46.
- [2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4]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道藏·太平经[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2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6] 刘昉. 旧唐书·黄巢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7] 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8] 沈括. 梦溪笔谈[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 [29]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0] 叶子奇. 草木子·克谨[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1] 宋濂. 元史·河渠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卫 华